

Fu Weici'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Thoughts

WANG Yu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ina

Received: July 5, 2024

Accepted: August 8, 2024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un. (2024). Fu Weici'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Though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057–06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07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3.007>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o. K2021–103).

Abstract: Currently, research on translators tends to focus on a few well-known literary translation figures, while less attention is paid to other translators who have produced numerous translations with far-reaching impacts. Therefor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Fu Weici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riching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ranslators. Based on the sorting,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adopts a descrip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Fu'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summarize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Fu's translation practi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bedient translation, 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 and autonomous translation. Each stage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ime, with his translations balancing both literary quality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Leveraging hi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Fu provides insightful discussions on translation issues from three aspects: 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translation style, and source text selection. He believes that translation is difficult due to word mea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should strive to reflect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work; and the selection of source texts should align with the translator's style and fill gaps. Fu's simple yet practic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Fu Weici;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impact; translation thought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ANG Yun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she is a teache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Her email address is yunwang@cqupt.edu.cn.

傅惟慈的翻譯實踐和翻譯思想

王 芸

重慶郵電大學

摘 要:當前,翻譯家研究集中在少數眾所周知的文學翻譯名人身上,對其他譯著頗豐、譯作影響深遠的翻譯家關注較少。因此,為豐富中國的翻譯家研究,對傅惟慈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意義重大。本文基於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挖掘和分析研究,採用描述性研究方法,系統梳理傅惟慈的翻譯實踐,歸納其翻譯思想。傅惟慈的翻譯實踐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遵命之譯、共商之譯、自主擇譯,每一階段都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譯作兼顧文學性和意識形態。傅惟慈憑藉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從翻譯難點、翻譯風格、翻譯選材三個方面對翻譯問題做了精闢論述,他認為翻譯難於詞義、難於雜學;譯文應儘量體現原作者風格,與原作風格一致;源文本選擇應契合譯者風格、填補空白。傅惟慈樸素而實用的翻譯觀對於指導翻譯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傅惟慈;翻譯實踐;翻譯影響;翻譯思想

基金項目:重慶郵電大學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專案批准號:K2021-103)。

一、引言

傅惟慈(1923—2014)是我國著名文學翻譯家,一生從譯、從教。他精通英、德、俄等多國語言,先後在輔仁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攻讀西方語言和文學。195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後,他開啟了在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執教生涯。同時,他專注於「爬格子」。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他從俄語及德語譯介了匈牙利、波蘭等國當代文學作品;從五十年代後期起從事德國文學翻譯;「文革」後,主要翻譯英美現當代文學作品。他從德語翻譯的經典著作《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臣僕》(*Der Untertan*)使其在翻譯界嶄露頭角。他譯自英語的英美文學作品如《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動物農場》(*Animal Farm*)則奠定了他作為資深翻譯家的基礎。他的譯作因其譯文簡潔凝練、形神兼備而深受好評,為外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傳播做出了貢獻。2004年,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授予其「資深翻譯家」稱號。然而,目前尚未見對傅惟慈的翻譯實踐及其翻譯思想的系統研究。相關研究主要以傅惟慈的譯作為研究對象,從不同理論視角或維度分析其譯作語言或風格(王媛,2016;張白樺等,2017;張旭、黃川,2018;程凱文等,2020;劉戀,2021;馬慧芳,2022)。也有少數學者從社會學視角對傅惟慈的文學翻譯活動進行研究,探討場域和資本對傅惟慈翻譯活動的影響(荊素蓉等,2021)。李文華也運用布迪厄社會學理論構建傅惟慈作為一個翻譯家的整體形象(李文華,2021)。總體來說,學界已經認識到傅惟慈譯作的深刻影響和獨特風格,但是仍缺乏對傅惟慈作為一個翻譯家的全面深入的考察。因此,對翻譯家傅惟慈的翻譯實踐和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基於相關文獻資料,本文採用描述性研究方法,旨在廓示傅惟慈五十餘年的翻譯實踐,並闡釋其翻譯觀點,以期豐富國內翻譯家研究,為當今譯壇的青年譯者的翻譯實踐和翻譯能力培養提供啟迪。

二、翻譯緣起

「翻譯家研究可以且有必要以社會為視角,對翻譯家的社會身份、家庭環境、發展軌跡等展開研究」(單宇等,2019:22)。傅惟慈出生於一個高級職員家庭,優渥的家庭條件使得他從小便有機會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培養對中外文學的濃厚興趣,打下良好的英語基礎。而後進入著名高等學府系統學習英、德、俄等幾門語言,並長期閱讀外文原著,為他後來從事文學翻譯積累了豐厚的語言和知識儲備。1950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留校後,他感悟到「偶然看一本書、一篇作品,受到觸動,引起共鳴,就動念把它介紹過來與人分享」(傅惟慈,2013a:001),這成為他做翻譯的原始動力。而他最終走上翻譯之路則是與他的人生哲學和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傅惟慈一生追求自由,然而,他生活的年代,政治運動頻繁,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嚴格。在翻譯中,他找到了遠離漩渦的自由。他認為,「它(指翻譯)使我的心智受到鍛煉,主觀能动性得以發揮。我依稀覺得,這時自己已經不再受制於人,而成為完整的自我了……譯書不僅使我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給我快樂,比單純閱讀帶來更大的快樂,因為這是經過一番揣摩、深刻體味原文精粹而獲得……環境雖然日趨嚴峻,甚至變得險惡,我卻為自己的精神尋找到一個樂園。」(2013a:001-002)

可以說,翻譯不僅能讓傅惟慈從大師級的創作中品味人生,而且成為他尋求生活中的一點自由意志的方式。鑒於此,傅惟慈最終決定背負起文學翻譯這一使命。

三、傅惟慈的翻譯生涯

1954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個譯本《戰鬥的洗禮》(*Tűzkeresztység*),他的翻譯之旅自此開始。2009年,他的最後一個譯本《父親的智慧》(*Wisdom of Our Fathers*)問世,傅惟慈就此擱筆,結束了貫穿半個世紀的翻譯活動。在其五十多年的翻譯生涯中,傅惟慈共翻譯了三十多部外國文學作品,總計約三四百萬字。傅惟慈長達半個世紀的翻譯活動受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的影響,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大致可以劃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一) 遵命之譯(1954-1962年)

建國初期,我國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文學、亞非拉第三世界文學和一些小國的文學成就。因此,這一時期,我國主要譯介的外國作品都有特定的地域和題材傾向性。正如何輝斌統計得出,自1950年起的28年間,我國譯介的外國文學「主要集中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也比較關注亞非拉國家的文學」(2014:95)。作為初出茅廬的年輕譯者,傅惟慈在這一階段主要翻譯他人或機構指定的這類作品。傅惟慈最早出版的大部頭譯著是從俄語轉譯的匈牙利戲劇《戰鬥的洗禮》,這部譯作奠定了他嚴謹的翻譯態度。作品出版後,他將此書作為禮物贈送給一位懂匈牙利語且對天主教很有研究的老同學。該同學給他指出二十多幾條不合天主教習慣的用語,他立即根據其意見做了若干修改。他認為,「這雖然只是個別詞語的翻譯,但如果不準確,就損害了原作的氣氛」(傅惟慈,2013b:177)。後來,他從德文譯本轉譯波蘭長篇小說《一個人的道路》(*Namiatka z Celulozy*)時,還專門學習了波蘭語,達到能夠借助字典看懂原文的程度,以求理解和翻譯的準確。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傅惟慈和邱崇仁合譯的《獄中書簡》(*Briefe aus dem Gefangnis*),這是他首次直接從德文進行翻譯。《獄中書簡》是一本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從敵人的監獄中寄給友人的書信集。全書反映了作者人格的光輝,反映了她對自然和生命永恆的熱愛。而傅惟慈翻譯她的作品也是出於對盧森堡遭遇的同情,以及對她人格和思想的欽佩。同年,為紀念弗裏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逝世 150 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傅惟慈翻譯的《席勒評傳》(*A Critical Biography of Friedrich Schiller*)。五十年代末期,傅惟慈還從德語或俄語譯本翻譯了東歐國家的作品《尤若夫詩選》(*Selected Poems of Attila Jozsef*)和《小花牛》(*Boci-Boci Tarka*)。

傅惟慈這一階段的翻譯作品基本是上級機關或出版社指派的任務。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無產階級文學或者第三世界文學,滿足了時代的需求,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傾向。傅惟慈(2013a)認為他翻譯的多數東歐文學作品是出於宣傳的需要,不具備較高的文學價值。儘管如此,這一階段的翻譯任務給了他實踐與成長的曆練,傅惟慈不僅加深了對外語的理解,對中文的熟練使用,翻譯能力日益精進,還摸索出一套翻譯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翻譯風格,為他今後成長為一位具有豐富翻譯經驗和精湛翻譯技巧的翻譯家奠定了基礎。

(二) 共商之譯(1962–1978 年)

在「共商之譯」階段,傅惟慈有了一定的選擇權利。通過與出版社協商,傅惟慈可以經出版社同意翻譯自己喜歡的作品。這一階段,他主要從事德語文學作品翻譯。從俄語轉譯了波蘭作品《一個人的道路》之後,他決定不再從德文翻譯其他國家的原作,因為他認為一本文學書在翻譯以後原文的精彩文字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失,如果再經過一次重譯,除了原來的故事情節,就沒多少文采可言了,因此他決定投身於直接翻譯真正的德國文學作品(傅惟慈 2013a:003)。他選譯了 20 世紀德語文學曼兄弟的兩部作品,取得了眾所周知的翻譯成就。196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傅惟慈翻譯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標誌著傅惟慈的翻譯之旅邁入了第二階段。該譯本品質卓越,問世後即刻得到讀者和翻譯界的廣泛認可,因而奠定了傅惟慈在翻譯界的地位。隨後,他又翻譯了另一部德語經典亨利希·曼的(Heinrich Mann)《臣僕》,這部作品歷經十年動盪歲月,於 1979 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傅惟慈的譯文通順自然,讓原作之精彩凸顯。楊武能曾高度評價他的這兩部譯作,「沒有人敢重譯它們,即便是在重譯成風的今天。」(楊武能,2001:66)除了翻譯著名德語長篇巨著,傅惟慈還翻譯了一些中短篇小說和一部戲劇喬治·畢希納的《丹東之死》(*Dantons Tod*),受當時國內環境的影響,這部戲劇直到 1981 年才得以面世。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政治運動頻繁,傅惟慈依舊積極投身於文學翻譯實踐,懷著崇高的信念和堅定的毅力,完成了多部巨著翻譯。這些譯作,作為人類寶貴的文化財富,在得以重見天日之後,將作品中穩固的力量傳達給中國人,促進了中外思想交流,推動中國文學的發展。

(三) 自主擇譯(1978–2009 年)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我國各項事業開始蓬勃發展,翻譯事業也不例外,曾經被禁的西方文學作品風靡全國,文學翻譯競相綻放。改革開放後,傅惟慈翻譯過的書陸續再版。與此同時,他決定翻譯自己喜歡的外國文學作品。至此,傅惟慈進入翻譯生涯的第三階段——可以自由選擇的階段,來到他翻譯人生的春天。在此階段,他主要翻譯英語現當代作品,外加少量德語作品。他的翻譯作品不僅包含懸疑、科幻小說等通俗文學,也包含許多嚴肅文學。他翻譯出版了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月亮與六便士》和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場》,將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介紹給中國讀者,成為翻譯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第一人。他的諸多譯作一版再版,成為譯文經典,對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克裏斯汀娜·諾德(Christiane Nord)認為,「翻譯行為中的源語文本只是「提供資訊」。面對所提供的資訊,包括譯者在內的任何接受者都會選擇他們感興趣的、有用的,或適合他們表達目的的資訊」(Nord, 2001: 25–26)。而傅惟慈最感興趣的作者莫過於格林和毛姆二人。傅惟慈喜愛並尊崇格林,是因為他看到了格林

作品裏除了晦暗的世界、卑劣的鬥爭之外，一些召喚人追求高尚與善良的東西以及人性中的同情、愛等救贖力量。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指出：「格林在當代小說家中獨樹一格……作為 20 世紀人類意識與憂慮的最卓越記錄者而被閱讀和被懷念」(Watts, 1996: 84)。除此之外，傅惟慈(2013a)也表示格林的語言深合他的口味，明快、自然，譬喻精闢、新鮮，不落俗套。因此在翻譯的第三階段伊始，傅惟慈首選格林的作品。1980 年，傅惟慈翻譯的《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由譯文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出版拉開了傅惟慈翻譯格林作品的序幕，也成為國內翻譯、研究格林作品的開端。隨後 30 餘年的時間裏，傅惟慈一直在格林作品的譯介上辛苦耕耘，又陸續翻譯出格林 4 部小說《一支出賣的槍》(*A Gun for Sale*)、《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A Burnt-out Case*)、《權利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密使》(*The Confidential Agent*)，校訂了姚錦清譯的《布賴頓硬糖》(*Brighton Rock*)。除了翻譯格林的小說外，他還節譯了格林的自傳和回憶錄《逃避之路》(*Ways of Escape*)以及格林遊記《尋找一個角色：兩部非洲日記》(*In Search of a Character: Two African Journals*)。可以說，傅惟慈是 20 世紀 80 年代翻譯格林的重要譯者，他的翻譯對國內認識格雷厄姆·格林並對其作品進行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除了格林，傅惟慈對毛姆其人其作也青睞有加。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1965)以其獨特的文學風格和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聞名於世。他的代表作品《月亮與六便士》和《人生的枷鎖》(*Of Bondage*)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使他成為了英國文學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1981 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傅惟慈翻譯的《月亮和六便士》，這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的首個譯本。因其翻譯準確傳神，措辭優雅而克制，傅譯《月亮和六便士》備受中國讀者推崇。此版本流傳甚久，上海譯文出版社分別在 1995 年、1997 年、2003 年、2009 年、2011 年、2012 年、2014 年、2018 年、2019 年等多次再版，堪稱譯文經典。鄢宏福(2019:20)認為，「此後出現的《月亮和六便士》複譯本中，在譯名、遣詞造句方面，經常能夠找到傅譯的影子。」他還指出，自 1995 年到 2013 年臺北麥田出版公司推出《月亮與六便士》本地譯本之前，傅惟慈譯本一直是臺灣唯一的譯本，對在臺灣讀者中間產生了長遠的影響，促進了兩岸人民的文化交流(2019:21)。此外，傅惟慈還翻譯了毛姆的兩篇小說《愛德華巴納爾德的墮落》(*The Fall of Edward Bernard*)和《午餐》(*The Luncheon*)，由作家出版社 1983 年收錄於傅惟慈和馮亦代選編的《毛姆短篇小說集》中出版。

傅惟慈也偏好閱讀偵探和科幻作品，致力於介紹、翻譯通俗文學作品。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通俗文學因內容簡單、缺乏藝術性，普遍被認為是不可登大雅之堂的文學種類，許多譯者亦不屑於翻譯此類作品。而在傅惟慈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要想認識今天的西方世界，要想瞭解資本主義社會面貌和人民心理，驚險小說確實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材料」(傅惟慈 2013b:163)。他認為，「我雖然同意文學有嚴肅與通俗之分，但其間的界限卻很難劃定」(傅惟慈,2013a:006)。這一觀點也是其他許多研究者的心聲。芮小河(2018)曾表示通俗類小說頻頻獲得具有聲譽的文學獎，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肖嫻等(2020)更肯定道，通俗文學也可能在讀者的閱讀、鑒賞中經典化。事實上，有不少經典著作確是由民間口頭文學經整理加工而來。對通俗文學作品的選擇，傅惟慈有語言品質上的追求，他所翻譯的通俗文學作品也是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其中美國小說家、劇作家雷蒙德·錢德勒備受他推崇。錢德勒是硬漢派偵探小說的奠基人之一，被譽為硬漢派偵探小說的靈魂。「硬漢派」風格提高了偵探小說的文學品質，引領了當今大部分偵探小說的方向。他也「以偵探小說而躋身經典文學殿堂，在西方文壇有「犯罪小說的桂冠詩人」美稱」(傅惟慈, 2013a:006)。傅惟慈翻譯了該作者的《長眠不醒》(*The Big Sleep*)和《高窗》(*The High Window*)，由群眾出版社於 2002 年以單行本出版，新星出版社於 2008 年再版。新星出版社社長在出版說明裏提到，「對於譯者和譯本的選擇，我們不盲從權威，不盲從經驗，只看翻譯品質。這次錢德勒作品的譯本，有兩本我們採用了傅惟慈先生的譯本，傅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大家，是我國翻譯領域的大師」(謝剛,2008:12)。在出版商看來，傅惟慈譯本就是品質的保障。傅惟慈還是《科幻世界》雜誌最早的譯者之一，八十年代在該雜誌發表過

不少譯作，對當時科幻文學的發展和繁榮，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通過對以錢德勒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的翻譯，傅惟慈為廣大讀者打開了一扇瞭解國外社會現實的窗口，也客觀上豐富了現代文學翻譯，推動了國內外通俗文學的研究。

在此期間，傅惟慈還翻譯了其他多種或嚴肅作品或消遣讀物。其中影響較大的一部當屬《動物農場》。2003年1月，傅惟慈《動物農場》譯稿由濰江出版社與董樂山譯《一九八四》(1984)合為一冊出版，系「反面烏托邦三部曲」之一。4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將董傅合譯的這兩部經典列入「現當代世界文學叢書」出版。2005年1月，傅譯《動物農場》被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列入「大家小書·洋經典」，出版了單行本。傅惟慈所譯的《動物農場》面世前後有多個該作品的中譯本走向讀者，但他的譯本因其語言風格獨特並忠實於原文而深受讀者喜愛，成為經典譯本之一，多次再版。

還有一部不得不提的譯作是傅惟慈翻譯的兒童繪本《愛心樹》(*The Giving Tree*)。《愛心樹》是美國繪本作家、詩人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創作的世界經典繪本，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廣受孩子喜愛。自2003年由南海出版社推廣出版以來，這個發生在男孩和大樹之間有關愛與被愛的故事讓無數中國讀者潸然淚下。在2005年度十佳童書評選中榮獲第四名。傅惟慈翻譯《愛心樹》這一行為在當時國人對繪本認識還不深入的情況下，可以說助力了國外優質繪本的譯介和傳播，同時推動了國內本土繪本的創作和發展。2018年，《愛心樹》中譯本引入中國15周年之際，它的銷量已然超過170萬冊。目前，它仍以每年數十次的印次加印發行，可見其長盛不衰。

2009年，南京譯林出版社出版了傅惟慈的最後一部譯作《父親的智慧》。這本書被作家葉兆言力薦為「感動全國的親子讀物」。這是傅惟慈90歲後的勞動成果，也是他作為父親的智慧。

翻譯家傅惟慈在第三階段的翻譯實踐中，翻譯了大量現當代英美文學作品，呈現出日臻成熟的翻譯文筆。這些作品兼具文學性和思想引領性，為推動當時的中國認識西方世界和瞭解異域文化風俗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在這一階段的翻譯實踐構成他整個翻譯生涯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為他翻譯生涯的全盛期。

四、傅惟慈的翻譯思想

翻譯思想指翻譯家對翻譯之「道」高度提升或高層級認知，這種認知又反過來指導他在更高層級上的時間，尤其獲得新的經驗，如此周而復始。翻譯思想表現為對譯事的某種原則主張或基本理念(方夢之，2011)。傅惟慈歷經跌宕起伏，但翻譯之心終生未泯。筆耕不輟的他，在充滿劇烈歷史變革的時代留下了傳世之作，為外國文學的譯介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兼具翻譯家、高校教師雙重身份的傅惟慈在翻譯方面的貢獻不止於此，他基於大量的文學翻譯實踐，總結出了許多富有真知灼見的翻譯感想以供有志於文學翻譯的年輕人參考。這些深思熟慮的翻譯感想散見於譯序、譯後記以及如《翻譯通訊》(今為《中國翻譯》)的學術期刊上，其中的絕大多數文章後來一起集中收錄在他的雜文集《牌戲人生》一書中。雖然他的翻譯觀念並不是系統性論斷，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這些思想不僅植於中國傳統的翻譯觀，還輔以大量的實踐經歷論證。他的翻譯觀點主要圍繞譯事之難、原作之選、風格之譯三個方面展開。

(一) 譯事之難——難於詞義、難於雜學

傅惟慈深耕翻譯多年後，對譯事之難深有體會。他表示，「我搞翻譯儘管已有不少年頭，也陸續出過幾本書，但未敢自詡風雅，更不敢覬覦文學家的桂冠。相反地，每想起自己從事的這個行當，總有一種誠惶誠恐的感覺……一路顛頓竭蹶、風險頻遇，直待最後一行譯完，才能暫時擱筆喘一口氣」(傅惟慈，1980:148)。

傅惟慈所言譯事之難集中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難於詞義。關於詞語的翻譯,他感觸很深,專門探討過詞語對譯的問題。傅惟慈贊同語義學所指出的任何一種語言的辭彙中都有部分詞具有兩重意義:所指意義(referential meaning)與內涵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他指出 connotative meaning 除了指詞的感情色彩(最簡單的是褒義和貶義)外,也應該包含詞的社會、文化含義(2013b:182)。然而,「由於我們的外語知識不是在使用該語言的自然環境中掌握的,普遍的缺陷是缺乏語感,即在辨識外語的感情色彩、社會文化含義和語言風格上『眼力』還不夠」(2013b:181)。他自己在翻譯的第一階段就深刻感受到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隔閡。比如,他翻譯《戰鬥的洗禮》時,很多有關天主教的詞語就出現過謬誤。他的譯本完成後,一位對天主教素有研究的老同學就為他指出二十幾條不合天主教習慣的詞語。比如「懺悔」應譯作「告解」、「做完禮拜」應譯為「望完彌撒」等。此經歷讓他格外重視詞語的準確翻譯。後來在翻譯《問題的核心》時,為了弄清楚書中人物威爾遜的身份——「U. A. C. 的會計」是什麼,他專門向國外朋友寫信請教,最終知道了 U. A. C. 是 United Africa Company——非洲聯合公司的縮寫。

理解原文是翻譯的基礎,如若對原文吃不透,則翻譯品質自然打折扣。而翻譯過程中,「辭彙空缺」的問題客觀存在。傅惟慈根據自己的個人經驗指出,除了大量閱讀原著以外,此空缺可以通過學習語義學予以彌合。他說,

「語義學,雖然不是解決翻譯單詞的百寶書,但至少教會我們更加重視詞語的含義,更加重視詞的格調,有些詞文雅,有些詞俚俗,有些詞委婉,有些詞詼諧,有的陳舊過時,有的觸犯禁忌……儘管找出一個個適當的對應詞還需要譯者自己絞盡腦汁,但可能少犯些錯誤,可能在忠實原文這一點上庶幾盡矣。」(傅惟慈,2013b:183)

二是難於雜學。對於翻譯者來說,透徹瞭解原作的背景知識是另一大挑戰。傅惟慈在為一位年輕譯者看稿時發現,譯稿中的錯誤主要牽涉到文化背景知識的問題。比如他提到,一個女孩子正在留聲機上放 Gilbert and Sullivan, 兩個人名不是兩個歌唱家,而是一個歌劇劇本作家、一個作曲家。(傅惟慈,2013b:180) 傅惟慈自己在翻譯中也經常被外國的風俗人情難住。他舉例說,在翻譯一本德國小說時,小說中一個宴會場景中,最後上的一道甜食是 the blazing plum-pudding, which was the children's favorite sweet。他起初對葡萄乾布丁在燃燒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經別人指點才知道在豪華的筵席上,布丁或冰激凌端上席面時要先澆上少許酒精,點燃起來,冒著蘭蘭的火苗(傅惟慈,1983:41)。這兩個例子足以說明,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簡單轉換,而是一種文化通過語言再現為另一種文化。呂叔湘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在《翻譯工作和「雜學」》一文中談到翻譯工作者應該擁有「雜學」知識(方夢之,2017:177)。傅惟慈也贊成翻譯工作者必須有廣泛的背景知識。所謂背景知識包含從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社會、教育、心理直到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傅惟慈,1983:41)。此外,為了避免此類錯誤,傅惟慈還建議譯者「要有老老實實的態度,手勤(多查書)口勤(多向人請教)」(傅惟慈,1983:42)。

(二) 原作之選——契合風格、填補空白

傅惟慈基於半個世紀的翻譯實踐,對翻譯什麼的問題有切身體會。他遵循兩大原則:

首先就是所選作品需是譯者鍾愛,並且作品風格和譯者的風格、審美情趣甚至人生經歷相契合。傅惟慈把文學翻譯者比作戲劇演員。他強調,一個認真從事表演藝術的演員對於登臺演出的機會並不是來者不拒的;他應該也有權選擇劇本和角色。文學翻譯者同樣也應該選擇自己要進行翻譯的作品。只有本子選對

了,才是譯文成功的基礎。(傅惟慈,2013b:187)他指出,

「不要隨便抓住一篇就匆忙動筆,要選自己所理解的和喜愛的……只有對一篇作品從形式到內容都已透徹理解,才會喜愛它;反過來,對作品沒有感情,就不能體會作品的深邃內容和微妙的表達手段。我並不主張譯者只能翻譯和自己『氣質相投』的作家的作品;但翻譯一部童子雞感情、思想格格不入的作品,就常常感到筆不從心。」(傅惟慈,1983:42)

換言之,傅惟慈還是主張譯者應當選擇和自己的風格契合的作品。在這方面,傅惟慈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均有。傅惟慈在第一階段翻譯的幾本書,大多是出版社指定的任務,譯時倍感吃力,雖然功夫不敢少下,但總覺得譯文同原文中間隔著一層什麼,溝通不起來。後來自主權擴大能向出版社推薦自己所選之書時,過去所體會到的艱澀之感就減少了。(傅惟慈,1983:42)在翻譯生涯的第三階段,傅惟慈的這一主張充分顯現在其原作選擇上。他投入巨大精力譯介的格林系列作品就是他鍾愛且契合其風格的。

傅惟慈被格林吸引原因有二。一是格林的語言深合傅惟慈的口味。在《我譯的第一部英國小說〈問題的核心〉》譯後記一文中,傅惟慈表示,格林的語言簡練、精確、樸實無華卻又很有分量,不少詞句讀起來像是一記記重錘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敘述中流露出詼諧和機智。我驚異大師的文筆,也驚異他細緻入微的心理剖析(傅惟慈,2008:329-330)。二是傅惟慈迷戀於格林書中的異國風光,感動於作家展示給讀者的精神世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社會動盪不安,傅惟慈在這段嚴峻的日子裏邂逅了英國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闖入光怪陸離的「格林國度」。小說中所描寫的痛苦煎熬著的靈魂,善與惡、靈與肉的較量,正映照了當時傅惟慈身處絕境的心路歷程,讓他知道世界上正在經受折磨的人不止他一個,從而對世界懷有微小的希望。

其次所選作品需填補空白。填補空白是指,儘量去譯介未經翻譯的作品。傅惟慈在有權利自主選擇時,讀中宣部召集專家擬定的「世界各國文學名著 200 部」書目時發現,德語文學中的現代文學只有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僕》尚未翻譯,便主動申請翻譯這兩部巨著。(2013a:003)在自主擇譯的第三階段更是認識到國人對於通俗文學有熱切的需求,以及通俗文學在鍛煉讀者的思考能力,提供許多方面的知識和對生活於不同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中的人民相互瞭解起溝通作用方面有明顯作用,(傅惟慈,2013b:173)因此他耕耘在通俗文學翻譯上,為讀者貢獻一部部文學價值很高的偵探小說作品,如錢德勒的《長眠不醒》《高窗》。此外,傅惟慈還主編了一部《外國現代小說驚險小說選集》,介紹一批優秀的偵探小說作品,供我國文學愛好者和文學創作者閱讀、借鑒。他在為這部小說集寫的一篇長序中論述道「這類通俗小說在西方廣泛流傳,是應社會所需。國內出版這樣一個集子有助於我們瞭解西方國家的社會面貌和人民心理。」(傅惟慈,2013a:006)通俗文學在傅惟慈等人的大量譯介下,填補了我國現代文學翻譯史上的一些空白。鑒於傅惟慈選材遵循填補空白的原則,他反對重譯。他說,「原則上,我一向不太贊成重譯。除非譯本過於蹩腳,糟蹋了原著。重譯只是炒冷飯,多不能避免剽竊之嫌。」(傅惟慈,2013b:147)

(三) 風格之譯——力求一致與再現

錢鐘書曾提出翻譯要越過三個距離。其中之一是「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的距離(錢鐘書,2009:775)。傅惟慈對此的體會是:

譯者的理解是針對原作品內容而言,而譯者的文風(或曰風格)的對立面則是原作品的形式。從狹義上看,風格主要是通過語言形式體現。所以這裏提出的原作品的形式也就是指原作的風格。錢先生

在這句話裏既提出譯者要理解原作品的內容,也提出譯者應使自己的風格接近原作。(傅惟慈,2013b:188)

因此文學翻譯涉及譯文與原作風格溝通的問題。傅惟慈認為,儘管譯者的風格如何與原作的風格統一起來一直以來都有爭議,但翻譯不等於再創造,翻譯不能撇開原作風格(傅惟慈,2013b:186)他和諸多翻譯家一樣,畢生的目標都是追求譯文在風格上的「神似」。

那麼,如何在翻譯中追求譯文與原文風格上的「神似」呢?傅惟慈指出文學翻譯者最低限度要做到兩點:一、辨識原作品的風格,體會作者的語言特色。二、譯文儘管不可能重現原作的風格,但絕不能破壞它,應該把一部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看成一個整體。(2013b:188)但是事實上,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風格,每個譯者也有自己的風格,因此翻譯中如何隱蔽自己的個人風格而儘量體現原作的風格一直困擾著譯者。在傅惟慈(2013b)看來,雖然文學翻譯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創作,但譯者在翻譯時卻不能不顧原作風格,只求突出自己。他以一個反例說明了風格對等的重要性。他指出臺灣譯本《事情的真相》就對原作中的比喻處理過於自由化。把「He was like the lagging finger of the barometer, still pointing to Fair long after its companion has moved to Stormy.」翻譯為「他是暴風雨裏遲開的花朵。他的同類已落紅遍地,而他還依然鮮嫩美好。」(傅惟慈,2013b:190),如此譯文不能凸顯原作的鮮明和生動,反而使原作的風格盡失,不再是格林了。

風格和語言的關係很密切,因此傅惟慈很注意譯文的語言風格,以求達到譯文高度再現原文風格的目標。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具體例子管窺他在譯文與原文風格對等上的追求。

原文:Ah, I wish I could make you see the enchantment of that spot, a corner hidden away from all the world, with the blue sky over head and the rich, luxurious trees. It was a feast of colour. And it was fragrant and cool. (Maugham, 2000: 246)

譯文:哎呀,我真希望我能把那迷惑人的地方描摹給你們聽。與人寰隔絕的一個幽僻的角落,頭頂上是蔚藍的天空,四周圍一片鬱鬱蒼蒼的樹木。那裏是觀賞不盡的色彩,芬芳馥鬱的香氣,陰翳涼爽的空氣。(傅惟慈,2011:233)

上述例子原文出自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眾所周知,毛姆的筆鋒如手術刀一樣鋒利,語言簡潔凝練而有力,凸顯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心理分析。李文丹曾言,中文的四字機構能巧妙地把各種語言要素和表現手段凝為一體,結構嚴整,蘊含豐富、文字洗練,音調和諧,具有很強的表現力(李文丹,1984:20)。因此用四字格翻譯毛姆的作品可以使譯文錦上添花,具備較好的修辭效果。而傅惟慈具備深厚的中文語言功底,在翻譯中對四字格的運用可謂得心應手。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傅惟慈一連使用四個四字格表達「鬱鬱蒼蒼」「觀賞不盡」「芬芳馥鬱」「陰翳涼爽」將那個地方的迷人之處簡潔、準確而又有力地表現出來,再現原文洗練又有格調的文風。此外,傅惟慈使用的四字格還在譯文中實現了音韻的和諧,使譯文通順自然。

部分研究者也對傅惟慈譯本進行研究,結論顯示,傅惟慈譯本與原作風格高度一致。如張白樺等(2017)從語域標記、詞語標記、句法標記、修辭標記等層面對他所翻譯的《月亮和六便士》譯文風格進行深入論證分析,指出傅惟慈通過語言的橋樑與作者情思互通、心靈相應,較好地沿襲了作者平實與深刻並重的寫作風格,使譯文曉暢得體、耐人尋味。張旭等(2018)也在《動物農場》兩個譯本的風格對比研究中證實傅惟慈譯本較為忠實於原文,力求重現作者喬治·奧威爾簡潔明瞭的寫作風格。

傅惟慈曾說,「對於我的譯文,不求多麼典雅,只求順達通暢,能叫讀者享受到一定的閱讀樂趣。如果在儘量保持原著的獨特風格中,再使自己的譯文添些文采,我就非常滿意了」(傅惟慈,2013a:005)。可見,力

求在翻譯中再現原作的風格,是傅惟慈翻譯實踐的一貫追求。

五、結語

翻譯折射了傅惟慈先生的人生哲學,對他來說,翻譯是一種尋求,或者說豐富人生的方法之一。傅惟慈的翻譯遵循忠實原文的標準的同時,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譯文語言簡潔凝練灑脫,恰如他恣意的人生。縱觀他五十年來的翻譯成就,不難發現,他的譯作活動受到大時代環境影響,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從五六十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翻譯到七八十年代的解禁文學翻譯,無不體現了中國社會當時對翻譯文學作品的需求方向。儘管傅惟慈所處的時代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的外部操縱性,他在選擇作品時堅持以文學價值為導向,注重原作的思想性,翻譯具有較高文學價值的作品。尤其是,他有先進思想,勇於求新,在改革開放初期率先譯介西方現當代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讓中國讀者瞭解現當代英美文學的創作手法以及社會現實,為豐富國人的精神世界、促進思想解放、推動中國翻譯文學的發展、融通中外文化溝通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的翻譯實踐在他的時代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作為躬耕實踐的翻譯家,傅惟慈從自身豐富的翻譯實踐出發,總結翻譯得失和翻譯思想,對於翻譯什麼、如何追求風格的對等,以及譯事之難都提供了獨到的見解。他的翻譯思想有助於翻譯學習者和從業者從中獲得激勵和啟示,從而更好地投身翻譯實踐,他的翻譯思想如今仍有很強的實用價值。

參考文獻

- ①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2000). *The moon and sixpence*.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 ② Nord, Christiane. (2001).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5-26.
- ③ Watts, Cedric W. (1996). *A preface to Green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84.
- ④ 程凱文,鄧棋方,鄧顏蕙:《「和而不同」——生態翻譯理論下〈月亮與六便士〉兩種中譯本的對比研究》,《翻譯研究與教學》,2020年第1期,頁106-111。
- ⑤ 方夢之(主編):《中國譯學大辭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頁16。
- ⑥ 方夢之,莊智象(主編):《中國翻譯家研究(當代卷)》,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 ⑦ 傅惟慈:《一篇文章的啟示——談翻譯工作者的社會價值》,《讀書》,1980年第3期,頁148-150。
- ⑧ 傅惟慈:《和青年文學翻譯工作者談心》,《中國翻譯》,1983年第12期,頁39-43。
- ⑨ 傅惟慈:《傅惟慈譯文自選集》,桂林:瀕江出版社2013a年版,頁(前言)001-008。
- ⑩ 傅惟慈:《牌戲人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b年版。
- ⑪ 傅惟慈:《我譯的第一部英國小說〈問題的核心〉》,格雷厄姆·格林(著),傅惟慈(譯):《問題的核心》,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頁325-331。
- ⑫ 何輝斌:《20世紀外國文學翻譯與評論的歷時的量化研究》,《外國語文》,2014年第4期,頁94-98。
- ⑬ 荊素蓉,李文華:《場域和資本對傅惟慈外國文學翻譯活動的制衡影響》,《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頁52-55。
- ⑭ 李文丹:《漢語四字結構的運用及其他》,《中國翻譯》,1984年第4期,頁20-23。
- ⑮ 李文華:《布爾迪厄社會學視角下翻譯家傅惟慈研究》,太原:山西大學2021年版。
- ⑯ 劉戀:《從劉宓慶的翻譯美學觀看〈月亮與六便士〉傅惟慈譯本中的文學美再現》,長沙:湖南師範大學2021版。
- ⑰ 馬慧芳:《月亮和六便士》譯本語言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2022年版。
- ⑱ 錢鐘書:《林紓的翻譯》,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 ⑲ 芮小河:《當代英語文學中的歷史見證與反烏托邦想像——2017年英語文學報告》,《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8年第4期,

頁 94-103。

- ⑳ 薩默賽特·毛姆(著),傅惟慈(譯):《月亮與六便士》,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 年版。
- ㉑ 單宇,範武邱,蔡萬爽:《數據時代翻譯家研究方法論》,《上海翻譯》,2019 年第 3 期,頁 18-23+94。
- ㉒ 王媛著:《傅惟慈英漢翻譯作品翻譯風格研究》,銀川:寧夏大學 2016 年版。
- ㉓ 肖嫻,陳元飛:《中國百年翻譯文學閱讀史變遷:表徵與反思》,《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0 年第 5 期,頁 49-60+158。
- ㉔ 謝剛:《漫長的等待——關於雷蒙德·錢德勒作品的出版》,《出版參考》,2008 年第 12 期,頁 24。
- ㉕ 鄒宏福:《海峽兩岸文學翻譯融合研究:以毛姆作品的譯介為例》,《外語與翻譯》,2019 年第 2 期,頁 19-24。
- ㉖ 楊武能:《曠達、瀟灑傅惟慈》,《出版廣角》,2001 年第 3 期,頁 66-67。
- ㉗ 張旭,黃川:《基於語料庫的〈動物農場〉譯者風格對比研究》,《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 6 期,頁 142-147+156。

(Editors: Bonnie WANG & JIANG Qing)